

此电子书由习之网 www.5sgou.com 搜集于互联网. 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 如要支持作者, 请购买正版

资中筠自选集(全五卷): 感时忧世

作者: 资中筠

感时忧世 第一部分

自序(1)

本人忝列“学者”圈, 以笔耕为业, 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 多为“内部”报告, 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 也多为应景文章, 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

西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说来，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 90 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 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

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

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说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这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

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

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竖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

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自序（2）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

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

2010 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 1980 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

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

《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

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

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自序（3）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

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

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 GDP 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

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

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X国人”。因此，近年来日

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国格与人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

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关于我的履历

不知从何时起，我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有时

还要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我还不以为意，后来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有机会就要说明：我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重头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间或也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但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专门的翻译，只是有关部门掌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各种语种的翻译名单，以便随时需要，临时召唤。在1959年至“文革”之前一段时期，看来我被列入了这个名单，所以不时应召接受任务，平时就在本单位工作。如此而已。另外，既然做对外交

流工作，接触的人中包括外国名人、要人，这也不足为奇。

最近做客“人民网”，关于我的介绍中又突出这一点。“天涯网”的介绍干脆把这作为我唯一的身份。我更感到有必要郑重说明，以免被误以为曾经是“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前几年有一本颇有影响的畅销书，作者在特殊年代曾任毛主席的翻译兼英语教师，在特殊的政治风云中曾红极一时，书中的自述情节对不明就里的公众说来颇“吸引眼球”，可能给不熟悉当代历史的人们一个错觉，以为曾担任高层翻译，就必然关系密切，或地位特殊。因是之故，我更觉得有必要予以澄清，说明我不属于那

一类人，也算是爱惜羽毛吧。在我所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最多说明在业务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认可，但也不一定是最高水平，因为外文水平更高的，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何况此类工作只不过“用其一技之长”，不会因此显赫起来。

另外还有一层，我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那时“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选的。后来越来越感到厌倦，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旁人看来也许以为值得羡慕，我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所以改革开放

之初刚可以有一点选择权，要求调工作不再算大逆不道，我就赶忙申请调到研究单位，以读、写为业。不论如何，总算有一点独立性，从此告别整天重复别人的话之苦。（至于笔译我自己选择的、自己欣赏的古典名著，或有意思的美文，那是一种“再创作”和自娱，又当别论。）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过为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特别是后半生虽然碌碌无大成就，但也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所以，对此类介绍产生逆反心理。

为什么外界偏偏注意这一点呢？也许是出于误解，以为说明一种地位，算是恭维；或是迎俗，大人物总是“吸引眼球”的。我本可以不去理会，但是近来遇到此类介绍越来越多，这一身份越来越突出，使我感到非表明态度不可，以免人们以为是我自己喜欢以此炫耀。我不能否认，也无需讳言我曾有此工作经历。幸好，本人在“文革”开始后入了另册，与红墙之内绝缘，于是在我的翻译经历中没有“四人帮”成员以及当时任何一位新贵，这是值得庆幸的。在那个特殊年代，为“首长翻译”确实只限于极少数特殊人物了。但是假设（只是假设）我当时竟然也被召去执行为某人翻译的

任务，当然是无法拒绝的，那么今天“曾为……翻译”该如何介绍呢？

所以，我今天对“独立”二字弥觉珍贵，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也希望世人以此知我、罪我。

（近有各种版本关于我的简历介绍，常有错误和不确处。以下附上我认可的简历，事实以此为准则，详略可自行摘取。）

资中筠简历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1930 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
1947 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

大学，1948 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 年毕业。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接待工作，以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70 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研究员、所长。专

业为国际政治与美国研究，旁涉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改革开放后多次访美，从事学术交流。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及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任研究员各一学年。

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 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

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利坚》）、《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以上在思想上较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的美利坚》、《财富的归宿》以及收入《斗室》和《读书人》的一些文章。）

译著：（法）巴尔扎克《公务员》、《浪

荡王孙》、《农民》，（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英）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等。

感时忧世 第二部分

也谈“中国模式”（1）

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为热门话题，而且是国际话题。主要起因于美欧国家经济危机，中国竟似安然度过，于是被认为有独特的“模式”，国人也津津乐道。当然也有不同看法，所以争论不断。“中国模式”之不可恃，不少经济界专家已对此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对我很有启发，不必再重复。不过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

再加论述。

实际上，当前“中国模式”之说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自己的特色，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英国与美国就不同，德国与日本也不同。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其共同的规律。现代经济发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则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模式”。前者已为实践证明失败，中国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中，这个过程尚未结束，自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

如果拨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框架”和可疑的数字，直面六十年来中国发展的现实，根据五亿到十三亿（现

在可能不止)的中国人的实际生存状况来分析,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一、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看法。究竟后三十年的成就是前三十年的继续还是反其道而行的结果?

肯定“中国模式”者认为前三十年成就很大,后三十年只是在以前的基础上修补发展;反对者认为前三十年基本上是“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加高度集权,外加中国特殊的闭关锁国和自己创造的各种“运动”的折腾,即使在较好的年月也没有摆脱短缺经济的困扰,最后弄得国库空虚、全民皆穷,经济濒于崩溃。如果没有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

始的改弦更张，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这是包括本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亲历和感受。否则就无所谓“改革开放”。

二、接下来的问题是后三十年来举世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是尚未改动的所谓“举国体制”以及国营垄断企业“优越性”的表现，还是打破枷锁逐步放开了民营经济，部分实行市场化，把受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走现代国家发展的共同道路的结果？若是前者，不但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反而应退守甚至强化旧的体制。实际上旧体制也回不去，于是成了巩固和加强当前有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奇迹”论者喜欢说中国以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道路，这是无视近代史的事实。我们开始走向现代化应该从鸦片战争算起，至少已经走了一百七十年，不能无视超过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通过辛勤耕耘已经奠定的现代化基础和积累的成绩——不仅是物质领域而且包括制度、文化、思想领域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十年前的再起步决不是紧接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在此以前可算古代），而是至少继承了整个20世纪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回首当年，如果我们从六十年前就遵循这条道路，现在理应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而且不必

付出如此巨大的“赶超”代价。

建设与破坏交替循环的历史是中国的不幸。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中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大规模破坏、大踏步倒退。远的不说，八年抗战打断了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建设，紧接着三年内战，建设无从谈起。到国民政府溃败之时已是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退到谷底。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休养生息，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全国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走出谷底，到50年代中期经济恢复成效显著，有欣欣向荣之势。当时也有“奇迹”之称。紧接着又几经折腾，走了许多弯路，生产力遭到破坏，直至把全民拖入“文革”浩劫，

经济再次跌到谷底。从“文革”后的最低基数出发，出现高增长率的数字，自不奇怪。以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再维持这样的百分比。

也谈“中国模式”(2)

何况，这一次的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自三十年前国门大开以来，欣逢世界步入全球化，许多壁垒已被打破，先进的发明创造可以现成地为我所用，而省去了发明者艰苦探索的过程；繁荣的国际市场和高消费能力支撑了我们迄今为止出口导向的经济。这些因素，加上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的思想大解放导致生产力大解放，才是近三十年迅猛发展的动因。中国十三亿人，只

要将原来被压抑的积极性释放出一部分，就可以产生可观的爆发力，取得显著的成绩，如果称之为“奇迹”或“起飞”，也不是中国特有的，许多后发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都有过这一现象，这是遵循常规的结果。

三、对现实国情的看法。是“形势一片大好”，还是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弊病也迅速滋生，腐败弥漫到各个领域，社会矛盾严重尖锐化，达到警戒线的边缘？我国至今将前后两个三十年都称为“社会主义”，可如果抛开意识形态偏见，正视社会实情，平心而论，无论是民主、民生、民权，还是社会正义、公平，比之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

多了还是少了？

如果承认现实存在严重问题，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些弊病是改革和市场经济之过，还是改革不到位之过？政府应该继续退出市场还是进一步强化干预？是国进民退还是限制国家垄断资本，给民营企业以公平竞争的环境，给每个公民以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总之，是需要退守和加固现有的基本体制，还是做实质性的改变？

四、洋人为何赞扬“中国模式”？其实洋人有各种评论，并非都是赞扬，最极端的有“中国崩溃论”，还有相当多的平实而深刻的分析评判，而我国媒体选择性的宣扬往往给人以一边倒的错觉。

不过肯定“中国模式”之论的确在国际上也相当流行。这就要研究一下，“客之美我者”所为何来？

一般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意识很强，他们的思维习惯是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长，困难时期尤其如此。例如一战以后欧洲遭受巨大破坏，就有斯宾格勒名著《西方的没落》出现；上世纪 50 年代苏联卫星先上天，引起美国一片恐慌，“导弹差距”之说盛行，激励美国加紧发展航天事业；80 年代末日本经济上升，特别是外贸竞争力骄人，“美国衰落论”流行一时。此说最早起因于长年在美执教的英国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而最有危机感的是美

国人自己。一时之间研究日本优越性之著作成为显学，其中突出的有著名东亚学家傅高义的畅销书《日本第一》。事实证明，“西方”既没有在“一战”后没落，美国实力也从未落后于苏联或日本。现在中国“崛起”之势令外界瞩目，而又适逢美欧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特别在意自己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感到挑战甚至威胁，于是夸大中国的力量，以激励本国人。奥巴马对美国教育不满，大讲中国教育如何优越，不久就要超过美国云云，试问家有在校生的中国家长有几人相信？

再者，外国人只重视中国当前经济的总量和竞争力，没有必要关心全体中

国人的祸福，对中国的民间疾苦更无切肤之痛。笔者十年前就曾与一位大力推崇中国快速发展的美国学者有过如下对话，我说：“你不能只看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要忘了，中国还有经济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和上亿的贫困人口。”他说：“这是你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东部发达地区 3000 万至 5000 万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这部分快速发展的实力已足以造成我们不能忽视的竞争力量。”我对此谈话印象深刻。站在外人的角度，他这样考虑问题无可厚非。我们自己呢？能置十三亿人的福祉和长远的民族前途于不顾？即使单纯谈 GDP，外人重视的是总量，而

我们必须考虑人均水平（何况分配还严重不均）。西方人重视人权，而且似乎常要对我国人权状况有所批评，但是他们关注的也只是精英层面的政治权利（当然这很重要），对于底层劳动者普遍的低人权状况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看不到，或者不关心。而正是这一状况部分地成就了中国暂时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为跨国资本赢得丰厚的利润。他们在国际气候会议上对中国施压，但是中国增长“模式”造成严重水土污染、资源枯竭之祸国殃民、贻害子孙，不在他们关注之列，从最近国际上对中国稀土出口的压力可见一斑。俗话说：“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作为中国人，我们能随

着对外人对“中国模式”的赞扬而飘飘然吗？

也谈“中国模式”(3)

毋庸赘言，“外人”不可一概而论。还有不少国际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秉承自己的理念，不辞艰辛，为中国的环保、扶贫等问题默默做出可贵的贡献。这是另一回事，他们不会对“中国模式”唱赞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五、还有一种论点：中国中央集权正在变为地方分权，以后发展的动力在于以各地方行政区为单位的竞争，犹如大企业间的竞争，达到繁荣和优化，从而可望是一条中国独特的前进道路。此说也是来自海外，并为我国某些论者所

认同。这是出于善良的愿望，可能受美国联邦制的启发，但是恰好忽视了中国特殊国情。有几个根本问题需要弄清楚：首先，竞争的胜负标准是什么？裁判是谁？

企业的裁判是市场，最终是广大消费者，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必须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所以才有“消费者是上帝”之说；竞技场上裁判有绝对权威，但必须遵循严格而尽人皆知的游戏规则，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最终的裁判还是广大观众。反观我国各级政府，从体制上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其辖区内的“子民”对“长官”并无任免权，甚至不能公开评判，裁判是上一级长官，

因此地方官需要竞相取悦的“上帝”首先不是本地老百姓，而是有奖惩、升降、任免权的上级领导，而且游戏规则不透明，只有“潜规则”，其运作不受当地居民监督。

其次，竞争的目标是什么？

追求名利是人之本性。只是地方官的名利或可与造福一方名垂青史联系起来，或可不顾“一路哭”，只求一己迁升、一家兴旺、鸡犬升天。在百姓有充分发言权和监督权，而且上下有通畅的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造福百姓与被上级认可的“政绩”也许可以一致起来，但是现在中国远不具备这种机制，所以“政绩”往往是与百姓的感受相脱离，甚至背道

而驰的，也就是敢于为民请命，为百姓所拥戴的官员很可能正因此而失宠于上，仕途不利，甚至惹火烧身。

再次，持“地方竞争”论者还忽视了一个他们所称道的“中国模式”的特点：迥异于古代封建领地、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联邦制、20世纪初中国曾有人提倡而未能实现的“联省自治”，甚至军阀割据时的独立王国，那就是省级领导最终人事权在中央。不论现在地方长官有多大权力，可以如何对中央政策法规阳奉阴违，中央对地方的作为可能难以控制，以至于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但各方诸侯的最终命运还在如来佛掌心。特别是现在异地为官，任期都不长，对

本地并无企业主或封建领主那种主人翁感和长远打算。他们成功的标准正在于快速升迁，如果持续多年留守一地（没有“动一动”），就是失败的表现。所以多数人只求短期的表面功绩，或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及时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而很少人愿埋头于长期方能见效的建设。因而只见大小城市高楼拔地起，而年久失修的地下管道系统鲜能得到修治。造成许多悲剧的“强拆”，也与在这种体制下的“竞赛”有关。即使有人下决心开启一项利民的长期事业，一旦工作调动，也往往人去政息。我无意指责今之地方官，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因此，我看不出在现有体制下，地方竞争如何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

也谈“中国模式”(4)

所有以上问题归根结底涉及建国的目的是什么？若是单纯为了 GDP，或为了外扬国威、炫耀一个光鲜辉煌的“盛世大国”，那么“举国体制”、“举省体制”乃至“举县体制”确实有效。其实这种利用集权，竭尽民力和财力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展示其辉煌的做法，最擅长的还不是我们这个“大国”，而是邻国“小兄弟”。那种在大型运动会或团体歌舞中集万众演员随号令排图案的壮观景象，我们最初还是从人家那里引进的，直到 21 世纪张艺谋策划奥运开幕式，还承认

朝鲜在整齐划一方面的长处。场面上的表演者是不需要演技、表情的，即使面有饥色也看不见，因为“人”已不存在，只剩下几何图形的“点”、“线”、“面”了。

若是真正以人为本，承认人除了满足口腹之需外，还有思想精神的追求；若是除了短期的 GDP 增长数字，还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的“文明崛起”，那么，应该承认，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早已到了拐点。健康的市场经济本能地就需要自由以释放出创造力，需要平等的权利以保证公平竞争，需要法治以规范和执行游戏规则，与之配套的制度自然是民主

而不是专制。在专制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许可以在短期做出成绩，但必将制约长期发展。

另一方面，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在促进优胜劣汰的同时也造成弱肉强食，制造不平等。百余年来各种各样的改良理论和措施因此而生。一个好的体制既要保护优胜劣汰，又要遏制或弥补弱肉强食的弊病，这也是近百年来发达国家普遍追求的方向。他们已经意识到有些事物是不属于市场的，例如教育和医疗。当前我国体制既制约“优胜劣汰”又扩大“弱肉强食”，市场经济既受到不合理的压制，而本不该属于市场的公共服务却又被推向市场。要扭转这种状况已不

能就经济论经济，就民生论民生。当前无论哪一个领域要向兴利除弊的方向走一步，都会遇到强大阻力，究其根源，阻力就来自强大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其难以动摇的地位与现有政治体制分不开。无可否认，首先需要改革的恰恰就是这“举国体制”——实际上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朝野日益高涨的“政改”呼声即由此而来。对这个道理，处庙堂之高的“当家人”显然比我辈处江湖之远的草民体会更深。说与不说，允许说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当然更重要的不是“言”而是“行”。

十三亿鲜活生命要的是安居乐业、

过“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即便是为了对外争国家荣誉，加强所谓“软实力”，耗用纳税人巨资办多少“奥运”、“世博”，建多少孔子学院，也掩盖不了中国特色的贪腐形象，洗不掉在政府廉洁度的国际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中国人以缺乏诚信名于世的耻辱。因此，与其高唱“中国模式”，不如低头寻找“中国道路”，因为中国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一处，只是要前进不要倒退。政体改革这一关是无法绕过的。

（2011年）

岁末杂感致友人（1）

X X：

一年容易，又见寒鸦绕枯枝。前些时发表了一篇关于读书人与道统的文章，承蒙诸好友关注。本想歇息一阵，躲进斗室，效古人“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做雪飞”。但是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忧思不断。所忧何来？年来脑中常浮起贾谊《治安策》开头的一段话：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

有纪，胡可谓治！

我对“才调更无伦”的贾生并非特别崇拜，《治安策》所谈到的具体内容与今天也关系不大。但是这段话就其抽象意义而言，竟可以一字不改适用于今天。贾谊所处的是汉文帝时，正当“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他忧的是什么呢？从皇朝的角度来说，西汉初期最大的问题是宗室诸王的坐大与争权，对大一统的帝国造成威胁。所以贾谊以及后来的晁错之辈都是力主削藩的。这是贾谊为汉室中央集权着想，为之痛哭的最大的隐患。但是当时朝臣或看不到这一点，或不敢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帝、景帝都不

曾果断地采取措施。贾谊提出这篇上疏是在文帝前元六年（前 174），到景帝前元三年（前 154）就发生有名的“吴楚七国之乱”，相隔仅二十年。景帝急忙把晁错作为牺牲品，“衣朝衣，斩东市”，也未能起安抚作用，终于免不了一场流血杀戮，平定之后还是采用他们的意见而维持稳定。而此时贾谊已经英年早逝，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有很大的预见性。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刘氏一姓的天下当然完全不同，只是表面形势颇为相似。方今“盛世”之颂不绝于耳，在不少国家挣扎于经济低迷的阴影中时，似乎“风景这边独好”，连洋人都艳羡。倚仗“举国体制”无节制地耗国库，奥

运之后是“六十大庆”，“大庆”之后是世博，世博之后是亚运。身处京、沪、穗这些大城市，只见一片流光溢彩，真是个“烈火烹油之势，锦绣繁华之乡”。然而在主流媒体一片颂歌之外，长太息之声绝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传与民间的感触反差之大，似乎说的不是一个社会。那么，是宣称“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则谀，还是我辈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贾谊年少气盛，恃才傲物，我不敢像他那样斥他人为“愚”或“谀”，特别是外国某些评论者未必都是低智商，更无理由讨好我们。我只能说，认为“已治已安”者，看的是表面和当下，而忧

心忡忡者看的是本质和长远。这长远有多远？贾谊所担忧的乱局在他上书之后二十年发作。当前“盛世”之下的忧患能等二十年才发作吗？

首先是改革形势的倒退。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同时已经到了社会转型的拐点，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已经滞后，刻不容缓，也是普遍的认知。然而在经济上只见国进民退，国家垄断日益加强，权钱勾结日益加剧。在体制上，前一阵朝野皆言“政改”，公众翘首以待，不但没有盼到，却忽见权威喉舌重弹“姓资”“姓社”的老调，甚至有现行制度是“核心利益”之说，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当年因决策者明

智地摒弃“姓资、姓社”之说而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从某些主流言论来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论调。言论不但没有放宽，反而“敏感”话题越来越多，难道这是“盛世”的气度？

岁末杂感致友人（2）

然则，坚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国模式”是否可恃？

经济发展模式之不可持续早已有多位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予以充分论证，不必赘言。一般人只从常识观察：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低工资、低人权、上下交相追求的 GDP 中不但含水分泡沫，且含血量极高；社会财富总量越增而贫富

悬殊、社会不公越严重……凡此种种，何以为继？还有为求城市表面光鲜而野蛮拆迁中之各种家破人亡悲剧。在人命关天面前，某执政官竟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骇人之论。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当前出现新一轮财富与人才外流潮，普通人没有安全感，用脚投票。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富、权贵们在高歌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有几人不亟亟于把财富与子女送到国外？甚至孕妇出国生产以使后代取得外国国籍，以至于促成一种利润丰厚的畸形产业。人之趋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风景这边独好”？唱颂歌者自己相信吗？

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本该如此）；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弥漫性的腐败、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造成灾难频发，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面对国内人权状况遭外人批评，

熟读外国文学的外交官竟抬出一百五十年前狄更斯小说中描述的社会来应对（！）。社会主义乎？资本主义乎？身处19世纪，还是21世纪？需要不需要改？

至于对外关系，话题更为“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记忆犹新，上个世纪曾经有一度我国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赖中美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力，我国打开了融入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即使在1989年的风波之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公开表示，我们不以意识形态为国际关系

的基础，国家关系不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大意）。这一明智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使我们的国际处境进一步恶化。我只能衷心希望，当前的对外关系理念至少能从中华民族利益的现实出发，守住这条线，而不倒退到上世纪 60 年代。

老夫（妇）耄矣，无能为矣。不论人们怎样津津乐道今日中国出现耄耋老人勇于直言的风景线，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所以我每见到好学深思的年轻人，读到有见地的文章著作，特别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有所坚守，不计利害、安危，执著地为百姓的权益鼓与呼，破谎言、求真理，为社会

正义、民族振兴脚踏实地、见缝插针地做着有益的事，都感到欣慰，升起希望，乃至肃然起敬。而这样的人却往往不见容于权势，屡遭横逆迫害，令我扼腕。

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高。如此则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从远期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实情况正好相反：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即便当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

的“慈善事业”，有善心做善事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也因行善而遭整肃。青年人入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做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和“被和谐”的民怨，一旦经济发生动荡，恐怕难有今日我们所讥笑的他国民众的承受力。则我辈衷心企盼的和平过渡恐怕又一次失去机会。比之于厝积薪而卧其上，岂不恰当？

何况，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封闭的老大帝国，身处 21 世纪，不可能自外于浩浩荡荡之世界潮流。现在流行的最简

便的说辞是一切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我想借用《论语》的一句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个人温饱无虑，别无他求。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这一不可避免的门槛。正因为如此，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我宁愿不做贾谊式的预言家，我宁愿落杞忧之讥。

天寒望善自珍摄，幸勿为风露所欺！

（2010年）

断想数则（1）

一 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顾炎武的原意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责的。按《日知录》明明是这样说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引语中间删节处是批评魏晋之士无父无君的话，这是顾炎武的儒家正统思想。姑存不论。他的本意很清楚，“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说这话的时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将亡之际，有一些士大夫已经纷纷降清，如钱谦益之流。顾对此十分愤慨，认为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政权给折腾完了，我们没有责任，但是“匹夫”应该坚守的是道义原则，不论谁入主中原，这一原则不能变，也就是“士”的气节。其实他所谓的“匹夫”还是指士大夫，

只是暂时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是无法负起这种道义责任的。

从何时起“天下”变成了“国家”呢？我没有考证，估计大约在晚清时期，眼看列强环伺，清政府无力保国，民间仁人志士蜂起，不论是否喊出这一口号，心中都存此意，认为挽救国家已不能靠肉食者谋之，需要民众担起责任。那时的“国家”绝不是清廷，而是中国的疆土，实际上那已是西方的主权、民主、宪政等概念输入之后，这种“匹夫有责”的观念导向通过革命推翻朝廷来救国。

根据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流传最广的时候是抗日战争

时期，那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个口号确实深入人心，而且覆盖到每一个人，包括贩夫走卒、农夫农妇，此时“天下”和“国家”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精神上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与现实的保卫主权和疆土是一致的。那是非常时期。然而在平时，细想起来，在专制制度下，“匹夫”对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责与权应该是相对应的，这是公民社会的观念，与顾炎武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过顾炎武也已认识到，国事只能由在位的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法负责的。至于道义上的担当，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天下”，似乎古今中外的“士”（略相当于知识分

子)都是引以为己任的。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或道义原则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中外史籍都不乏例证。专制统治者一方面剥夺民间人士为“天下”负责的权利，遇到危机时却又要他们对“国家”负责，其得可乎？

还有，顾炎武所说“率兽食人”，当然不是真的有人领着野兽去吃人，而是出自《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可悲的是，这种现象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顾炎武如看到那些讲究的“宠物医院”，同时许多人看不上、看不起病，不知会作何感想。即便不是“率兽食人”，至少也由于“仁义充塞”之故，当属“天

下”范畴，因此应在“匹夫”责任之内。
但是，我辈“匹夫”怎样对此负责呢？

断想数则（2）

二 幸亏有彭德怀冤案

“大跃进”饿死人之事至今有人不承认，现在人们习惯的提法还是“三年自然灾害”。前几年还有北大教师提到这段历史时遭学生当场斥责为造谣，闹到校领导那里，结果竟是这位教员被“下课”。近来还看到网上有为发动“大跃进”的最高领袖辩护，列举其曾批评过下面“浮夸”之“语录”，以说明罪在下面干部而领袖是英明的。对于最后这一点，反驳起来还需费一点考证和口舌。幸好有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敢于撻其逆鳞，

引来龙颜大怒，严惩不贷，且株连无数，造成国家级大冤案。此案尽人皆知，有关案情已经详细公布，无法封杀。个中是非彰明较著，而且已有决议正式平反。仅举此一事就足以驳倒所谓领袖受蒙蔽，责任在下面之妄言。假设没有彭老总这样一位显赫人物铸成史有定论的著名冤案，当时千百万凭良心、说真话而遭整肃的小干部、小人物可能淹没于历史谎言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个人以后得以“平反”，也难掀起波澜，扭转广大“被愚民”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讲，彭老总以自己的牺牲做出的另一贡献是为明辨是非功过提供了一条铁证。

三 “官府”是中国经济的克星近读

《文汇报》载一篇关于中国清末民初的“票号”、“钱庄”的文章，说明那时的传统金融借贷制度已经相当发达，并且对实业的发展做出过不少贡献。联想起早期美国华尔街的状况，那是一个大赌场，坑蒙拐骗无所不为。相比之下，我国的晋商、徽商所建立的传统借贷制度要更加规范、诚信程度高得多。华尔街逐步从无序走向有序主要是靠那里的大玩家自己感觉到这样乱杀乱砍几败俱伤，需要建立秩序，立一些规矩，同时涌现出一些有威望、有眼光的领袖人物，逐步建立自己的组织（或俱乐部）、制定规则。总之完全是凭自发的需要和同行的智慧，逐渐规范、繁荣起来。那时政府

处于弱势，很难有所作为。政府开始干预是后来的事。

反观我国的商人，其实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自己的行业公会，有自然形成的、威望能服众的领袖人物，每一个阶段也都有一批相当规模的企业及其代表人物，成就一时的繁荣。远的不说，从晚清以张謇为代表的一批实业家，到民国时期形成的现代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都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为什么最终发达不起来？究其因，一是战乱，一是官府。战乱姑不论，中国的民营企业总是与官府呈微妙关系，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受到“关注”，不是成为“唐僧肉”，随时被征调、盘剥，就是社会影响太大遭忌，

随时可获罪。于是不少商人就设法在官府中找靠山，或钱权交易，或成为“红顶商人”。但是官场多变，又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洋人常说中国人是天生的企业家，能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大约就是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锻炼出来的。从传统型到现代型的企业和企业家前仆后继，但最终下场多为悲剧。每一个时代的官商关系在形式上有其特色，而本质上是相同的。到1949年以后，干脆全部消灭民营工商业，全部入“官”。改革开放以后又逐步恢复民营经济，私人资本又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壮大。而在官府中寻求靠山，或为权力寻租对象，或争取到“红顶”（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也是传统的继续。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民营企业的不安全感有甚于民国时期,因而也更缺乏长远打算,现在新一轮“国进民退”实质上还是百年来官对商压制的继续。究其原因,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始终没有切实的保障,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是不论是近百年还是近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的发达从根本上讲,还是靠民营经济的繁荣。而民营经济的自然诉求是法治完备和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理想的境界是二者相互促进成为良性循环。中国历史上可能达到过这一循环的边缘,旋即为战乱所打断。现在无战乱之虞,但是还看不出进入这一良性

循环的迹象。

四 过敏体有一个常见词“敏感”，其广泛的用途为我国所特有。话题、词语、人名，乃至日期，都可以冠以“敏感”，这个词的含义本身也属于“敏感”，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话题一列入“敏感”，就说得不得。每年到敏感日期如临大敌，似乎随时会有洪水滔天。敏感人物有死人也有活人，坚决在一切可能出现的地方予以屏蔽，竭力装作不存在，以至于照片搞换头术，历史被歪曲、改写或干脆留白。活着的敏感人物，轻则封杀其言论空间，重则“上手段”，总之是部分或全部剥夺其公民自由权。至于“敏感”话题，多得不胜枚举，而且无标准、无

边缘，无理可喻。多数敏感话题恰好是民众所关心的热点事件。大家越关心，越说不得。有关部门不定期“内部”通告，列出一份话题目录单，在“涉言”单位（此词是我杜撰，套用“涉外”单位）层层传达，但仍然是“内部”，公开是不承认的。

在此情况下，“涉言”从业者有两种反应：或练就一副更加过敏的神经，不待指令，体会上意，主动自律，确保安全，其结果肌体日益萎缩，所耕耘的园地日益荒芜；或逐渐产生抗过敏原，虽时或有被病魔击倒之痛，但前仆后继，在风不调、雨不顺的气候中开辟一片抗过敏植物园，自成风景。前一种如成为

主流，则不仅是“涉言”领域，更将使泱泱大国成为一个“过敏体”，民族精神日益萎靡。后一种对应之策才是希望所在。

过敏是一种病，我认识一个孩子，天生对鸡蛋、牛奶、花生等营养丰富之物都过敏，令人发愁，医生提出的方案是不完全回避，而是反其道而行，把过敏的食物一点点加入饭食，最初极小剂量，让他承受一下，然后慢慢加大。当然有时过量一点也发病，但不会致命，过了这个阶段承受力加强，果然此儿不再过敏，能够正常吸收营养，健康成长。我想对于所谓“敏感”话题，也可照此办理，像那位医生一样，逐步推进。当

然，这个分寸和剂量应该怎么掌握，有待“涉言”从业者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高度艺术。不过如果一味回避而不推进，最后整个民族就将营养不良而弱不禁风，不堪一击。

（2010年）

公民社会离我们有多远？（1）

5·12大地震之后，“公民意识觉醒”、“公民社会在望”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比较突出的有名作家张抗抗热情讴歌志愿者的讲话和文章，有资深公益人士徐永光提出的定今年为我国“公民社会元年”，还有比较审慎的提法是公民社会

“曙光初现”。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其依据是在这次特大灾难中出现的——与以往历次救灾不同的——空前规模的民间参与。

一 灾难激发出来的公益热情一般说来，一次非常的灾难，足以使全社会的悲悯之心都迸发出来，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全民赈灾也不是第一次。但是与以往相比(例如 1998 年的特大洪灾)，今年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当然是震灾款物来源之广泛、数量和规模之巨大，以及捐赠人的热情和踊跃，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 NGO 和志愿者的参与构成一道引人瞩目的风景，而且从此这一观念进一步在公众中普及。从人性

出发，公益慈善行为就是体现了一种自愿的、非功利的、助人为乐的精神，是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的发扬。因此，首先应强调自愿，而不是出于任何形式的强迫。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捐赠者都是志愿者。不过志愿者多数不一定是钱物的捐赠者，而是以各种方式为需要帮助的人贡献力量。通俗地说，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本质是对他人的关怀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记得这句口号曾盛行于抗日战争期间，那是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秋，人人感到匹夫有责。但是在平时，应该承认，我国内地的志愿服务精神尚未成风。不用与发达国家比，较之港、台，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汶

川地震志愿者的空前活跃意义重大，值得大书而特书。

二 “企业责任”与志愿者的兴起公益慈善、企业责任（CSR）、志愿者、非政府组织（NGO），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我国，都是改革开放中兴起的新事物。它们之间既有重叠，又有区别，而且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公民社会”的观念过去只停留在少数研究者和知识精英中间，开始见诸媒体，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还是最近的事。公益慈善事业的发达和“志愿者”精神的普及当然代表公民意识的觉醒，但不能与公民社会等同起来，何况发达和普及的程度还有一定的限度。

在我国发展比较快的是公益慈善领域，对它的认识和自觉性也逐渐成熟。事实上慈善事业古已有之。即使现代意义的公益组织和基金会，也与现代民营企业一样，在我国已有百年的历史。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实业家兼慈善家。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曲折，现在又重新成为“新事物”。它的兴起和发展当然是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分不开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由最高决策开始，而后全面推开的，那么公益慈善事业却是顺应社会的客观需要，由民间蓬勃发展起来，然后引起执政者的关注，推动政策法规的改革。也可以说是“以民促官”。国际潮流和域外经验

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算起，在二十余年中这一新生事物是以加速度发展，每隔几年就进入一个“新阶段”，进入 21 世纪以来，发展更为迅猛。尤其是 2008 年，以汶川地震为标志，达到了空前的高潮，说明它符合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潮流。

公民社会离我们有多远？（2）

应该承认，在我国新时期，公益慈善捐赠的主力是民营经济，随着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确立和上升，“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观念也迅速加强。其原因部分来自企业界的自觉，部分来自社会压力——在贫富悬殊日益

尖锐化的情况下，公众对“富人”的期待。这种期待有时有偏颇之处，把公益视为均贫富的手段，以媒体宣传的捐赠多少来衡量企业或企业家的优劣，甚至以一次性捐赠数与资产的比例来衡量，或把处境完全不同的中国民营企业与美国企业家作简单类比。凡此种种，是对公益的一种误解，恰好违背自愿的原则，无助于发扬志愿精神。这说明我国公众对企业责任的认知还不成熟。

“志愿者”是伴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而逐渐普及的，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作为一种理想精神的表现，受到社会的嘉许。志愿者要进行有效的活动，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当地政府的支

持与居民（服务对象）的配合，其基础是充分的理解。无论是平时，还是非常时期的成功案例都离不开这两个条件。可惜，就全社会而言，这种理解还相当欠缺。一般说来，地方政府欢迎钱和物，却不一定欢迎人及其活动。他们往往在意的是掌握对钱物的控制，不愿意“大权旁落”。而志愿者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福利，或是带有社会改良性质的项目，与地方政府所关心的“政绩”可能不符合——姑且不论更坏的、与腐败有关的原因。另外，志愿者都是外来者，他们的出现打破当地多少年形成的成规和潜规则，满腔热情为当地“做好事”，却不一定被接受，常会遇到各种尴尬局面。

在志愿者本身来讲，也有不成熟、经验不足，主观愿望不切实际以及操作不规范等缺陷。最主要的是这是一项新事物，遇到一系列问题时没有相适应的法规，得不到法律保障。于是与其他公益事业一样，“做好事”而可能陷入“不合法”。

三 NGO 的困境上述对志愿者的处境也适用于 NGO。NGO 可以说是有组织的志愿者。作为“非政府组织”，在我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NGO 一词是舶来品，就广义而言，与传统的民间组织属性相同。各类传统民间组织在我国历史悠久，例如各种行业公会、同乡会、共济会、各色帮会等。它们事实上也从事不少公益慈善活动，其与现代 NGO 最大的区别是，

后者虽然都各有自己的特定关注范围，例如环保、教育，等等，但总的是以全社会的福利为怀，与发起人和组织者本身的利害无关，而传统的组织则比较封闭，在特定人群中自行其是，代表比较狭隘的利益。其初始的本意可能于社会无害，但是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发展起来，就可能带有排他性，或牺牲其他人群的利益。在皇权专政，没有民权保障，没有结社自由的制度下，往往发展成与官府对抗的法外组织（姑不论这种对抗的正义性如何），从维权走向反社会，或成为揭竿而起的造反组织。所以历代统治者对民间组织以及有组织的民间集体活动都十分警惕，不时予以取缔

和镇压。1949 年以后，此类自发的民间团体基本绝迹。一切群众团体如工、青、妇、工商联以及文联等，都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之下，不再有真正的“非政府组织”，有时某些组织以“非官方”出面，也只是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在国外便于进行民间国际交往，在国内作为共产党联系各界群体的桥梁，为贯彻党的政策和意图进行宣传教育。它们间或也向上反映本群体的困难和要求，但是一旦有“为民请命”之嫌，轻则受批判，重则犯“路线错误”。至于“慈善”，在私有制被彻底否定的年代，被批判为富人的“伪善”，是“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的手段”，在当时的“社会

主义”理念中根本无立足之地。

公民社会离我们有多远？（3）

重温这一段历史背景，是要说明我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是与欧美截然不同的，当前我国 NGO 所遇到的困境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尽管进入新时期，从执政理念到社会实际到公众心理，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公益慈善得到大力肯定，几年前正式进入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富人捐赠得到公众、政府和主流媒体的鼓励和表彰。但是另一方面，本该与之相适应的非政府组织的生存条件却仍受到种种羁绊。这种羁绊一方面与上述的历史背景有关——政府对“非政府”组

织总是存在疑虑；另一方面又加入新的国际因素——“冷战”时期，一些外国基金会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对不同制度的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近年来又与“颜色革命”联系起来。所以决策者一方面对公益慈善捐赠持欢迎态度——不论来自何方，包括境外资源；另一方面又担心失控，担心对现政权和现有体制形成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早已受到诟病、显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旧法规，特别是社会团体“双重登记”制度，虽经多年来各方人士呼吁改革，始终难以突破。作为公益活动主力的官办组织（GONGOs）虽然有许多优越条件，并得到政策的优惠倾斜，但是面对急剧

增长、花样繁多的社会需求已日益显示出局限性。汶川地震中作为被指定的接受捐赠主要渠道“红十字会”所遇到的窘境和责难就是证明。而怀着满腔热情的民间志愿者和组织要“做好事”却困难重重，需要寻求各种变通之道，有人戏称之为“曲线救国”。通过“曲线救国”，多年来也有可观的成就，只是运作成本较高，既浪费资源，又不公平。于是出现一种吊诡现象：越是草根民间组织越难得到本土资源，近一二十年来站住脚且发展壮大，在社会上有一定声誉的组织，其资助来源往往以境外居多。事实上，GONGOS 也欢迎境外捐赠。在这个领域内，我们还没有完整而权威的资料库。

如果能以十年为期，对有组织的公益慈善活动的财源做一番统计，画出境内与境外来源的比例及其消长的曲线，将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项目。

除了各级当政者的态度外，还有公众的认知和接受程度的问题。《中国发展简报》最近发表了“公众对 NGO 参与救灾认知调查”，证明这一认知度还是比较低的。此调查是在 2008 年 6—8 月进行的，亦即在 NGO 活动最集中、成绩最显著、媒体报道最多的时候，而且调查对象包括灾区的公众。那么可以想见，平时对其他领域的 NGO 的普遍认知度将更低。

四 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尚待时日

凡此种种，说明 NGO 和志愿者得以顺利发展，在全民中获得理解和普及，尚需时日。“公民社会”恐怕更加遥远。限于篇幅，此处无法展开对“公民社会”的讨论。简单说来，“公民”的观念与“臣民”是对立的。公民意识起于独立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充分认知，最重要的是对社会的主人翁感。在赈灾活动中涌现出大批的志愿者，其热情令人感佩，这种热情可以凝练为公民意识，但不能与之等量齐观；也可能只是一时的热情，未上升到自觉的领域。从外部而言，公民社会的要素不外乎健康的市场经济、完备的法治和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对“四大自由”的保障——

与 NGO 相关联的，特别是结社自由。强大而繁荣的民营经济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此外还有青少年自幼从家庭、学校、社会获得的完整的公民教育。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已经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和积极推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内，还很难有一席之地。从根本上说，对何谓“公民”，恐怕多数教育行政长官和在校老师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心目中的“好学生”不一定能成为“好公民”。所以在青少年中推广公民教育尚难在近期内实现，现存的教育导向难以达到培养有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的目标。

如果略作展望，在可望的将来，除

非经济出现重大问题，我国公益捐赠有望持续增长，公益慈善事业会有比较长足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将较快普及，各种类型的公益金会也将不断出现。与公益事业的前景相比较，志愿者和 NGO 的发展则相对滞后，需经历更多曲折和困难，因为它们涉及更加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在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中，它们将如鱼得水，而这一新生事物势不可挡的蓬勃成长，必然有助于公民意识的逐渐普及。不过这将是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我愿与有志之士、有识之士一道为之鼓与呼。

（2008 年）

感时忧世 第三部分

我的困惑（1）

相当长时间以来，何谓“资本主义”国家，何谓“社会主义”国家，日益令我困惑。余也愚钝，在理论上引经据典，推敲“提法”非所长，只能就自己经验、常识所及，就国内外实情，摆出问题以求教于识者。

据我理解，追根溯源，“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思潮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阶段，社会矛盾尖锐化之际，是关注弱势群体，向着平等方向的诉求。在这一旗号下，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又形

成各种流派，总之是以资本为主导的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竞争的一个对立面，在实践中有导致改良的，有导致颠覆和革命的。这是我粗浅的概括，当然是不严谨、不全面的，不过足以引出我的困惑。自 1949 年以来，我们从“天天讲”的“政治学习”中学到的是：我们实行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比“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有“无比优越性”，也不同于其他形形色色的“虚伪”的“社会主义”，包括社会民主党“那一套”。优越性表现在：一、用暴力革命推翻了旧政权，比任何改良都彻底。

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消灭了剥削。

三、实行计划经济，一切生产资料归“国有”（或曰“全民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劳动者享受劳保，生、老、病、死都由“公家”包了，无后顾之忧，由于是为自己工作，因而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四、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构成的”，“拒腐蚀，永不沾”。所有职业都是平等的，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

五、一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唯利是图”，消灭了私有制，也就取消了利益驱动，以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从而造就摆脱了“低级趣味”的“社会主义新

人”。及至“文革”后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物质刺激，取消“八级工资制”，连老技术工人的相对高工资都成为“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实行绝对平均主义。

六、国家就是专政机器。社会主义国家由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后来改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实际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只有资本家有自由，劳动人民只有失业的自由。到“文革”发展到“在一切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贯穿在日常生活之中。

七、从“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上世纪50年代前期）到“赫鲁晓夫假

共产主义及其在历史上的教训”（1963—1964，《九评》之一），苏联的“榜样”从正面到反面。苏联“变修”表现在对内专政有所松动（解冻），许诺物质利益（土豆烧牛肉），对外与美国关系缓和，只有我们坚持“列宁主义”。据此掀起批判党内“三和一少”（“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少支持民族独立运动）路线，而提倡“三斗一多”。

那一段中共在国际共运中舌战群雄的历史，不是本文的主题，姑不赘言。总之，由“赶超”，到“放卫星”到三年大饥荒，经过调整，刚开始缓过气来，又害怕由“富”变“修”（其实离“富”还远着呢），经过几年“理论准备”，终

于于 1966 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达到登峰造极，“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指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令全国乃至举世震惊。以后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穷”成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终于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隐性的特权和腐败（那时的委婉语为“不正之风”）丛生，在绝对平均的表面下，一切实际的机会和福利按权力等级分配。就以全民挨饿的那几年为例，传说领袖为之废肉食（多长时间不可考），黎民感动，但是在千万饿殍中有几个是“干部”？城乡比例多少？在城里得浮肿病的比例与级别成反比是事实，“穷”能实现平等吗？

事实上出现的是权力成为变本加厉追逐的对象，因为生存状态从属于权力的大小，或赖权力的恩赐。国际上则大部分国家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包括共产党，都被列入“帝、修、反”之列，“朋友”只剩下亚洲的西哈努克亲王和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外加一系列自称“毛派”的革命小组织和政党。

我的困惑（2）

现在重提这段历史是追忆当年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样的“社会主义”走上了绝路。

俱往矣！那么今朝如何呢？我们的“社会主义”特征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有目共睹，经济有了飞跃的

发展，相对说来，思想政治环境也在曲折中走向一定程度的宽松。因开放而有了横向比较的条件：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以及被认为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前独联体成员外加东欧国家，都可以作为参照。

如果说资本主义片面追求效率，社会主义以“公平”自许，我国社会的“公平”特征如何表现呢？论结果的平等，不论是统计上的基尼系数和肉眼看得到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域差距、职业差距，等等，我们比哪个新、老“资本主义”国家差距更小？论机会平等，也就是“起跑线”问题，城里的民工子弟、乡村的“留守儿童”与

那些从幼儿园就入各种高价“班”，或请私人家教的儿童，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吗？普及全民义务教育是造就机会平等的最基本的条件，我国的义务教育能比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优越呢（指事实，不是指写在纸上的政策口号）？

关于“人权”，我们一贯强调“生存权”。最振振有词的说法是：以世界 7% 的土地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一说五分之一）的人口。撇开国家承认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不论，大批被拖欠工资的民工、矿难不断的矿区工人及其家属、被强占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农民、至今没有彻底查清的令人发指的黑砖窑事件中的奴隶工、因贫而以卖血为“致富”捷

径从而感染艾滋病的群体及其遗孤……
他们的生存权如何？有一次会上听到一位经常下基层调查的社会学家的发言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他说目前真正的不平等还是权利的不平等，超过财富的差距。我理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如果充分享受到现在也已经为我国领导人承认为普世性的“人权”，那么大多数人可以放手在规范的条件下凭劳动追求财富和幸福，而不受剥夺。其实这也适用于民营中小企业。

关于环保，记得上个世纪 70 年代，欧美和日本舆论大力关注环保问题，在经过筛选进入我国的有限信息中，这个问题占很大分量，我国媒体据此宣传资

本主义之“腐朽没落”，领导人在见外宾时也谈这个问题。凡有洋人问及我国是否注意到污染问题，标准答案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不以牟利为先而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不会有污染问题。曾几何时，蓝天、绿水、青山、星空，对许多人来说已成追忆，无净水可用的危机已非杞人忧天。其实就在嘲笑他国污染的年代，我国自己的问题早已悄悄出现，记得上世纪70年代曾访问沈阳，向铁西区方向望去，天空一片黄锈色。只是当时“政治挂帅”，不肯承认那就是污染，同时又树立治污样板。那家“样板”工厂不知用什么办法，可使锅炉排白烟。这是供外宾参观的一个点。

我对机械一窍不通，完全没有听懂技术工人所介绍的原理。外宾看过赞叹之余，不免要问，这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能推广到邻近那么多黑烟滚滚的工厂呢？国营的“优越性”就在于可以不受制于利润的追求，考虑较长远的利益，为什么不纳入计划呢？我当时也不明白。后来明白，其实那时污染问题根本不在视野之内。只是在尼克松访华后有限的开放形势下，为应付洋人，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而做一些样子。实际就是那一家工厂也未过关，冒白烟的锅炉需要暂停生产，外宾走后再恢复生产，照常冒黑烟。

我的困惑（3）

诚然，污染是工业化的产物，始作俑者是那些先富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浪费自然资源、污染环境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但是后来觉悟了，主要是在一些先驱人物的呼唤下广大群众觉悟了，进行规模浩大锲而不舍的斗争，其中也有因触犯既得利益而流血牺牲，遂有后来的治污成绩。以前不说，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算起，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破坏环境的速度的比例，比“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呢？我国各级“社会主义”政府对关系百姓生存的严重污染问题的责任感和执法力度比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呢？

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

不同程度上意识到有若干领域是不能完全推向市场，以利润为驱动的，例如：教育、医疗、学术、社会保障、文物保护等。而在我国这些领域，不论是明的还是暗的市场化的程度，不必与欧洲国家比，比最讲自由市场的美国也远远超过。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在经济政策上被攻击为“劫贫济富”，其2006年用于社会保险的联邦预算占GDP的7%，其中医疗保险5%(国防预算占GDP的)。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医疗保险大部分是个人或所在公司向保险公司购买，以及各州政府补贴。联邦政府的拨款只是补其不足部分，特别是医疗救助这一块——即65岁以上老人全部免费医疗以

及对低收入者（买不起保险）的补贴。那些“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国家，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府负担的部分就更大了。（至于现在出现过分平均、政府负担过大等问题，难以为继，也可以说是过度“社会主义化”，那是另一个问题。）

对于当前的种种问题的由来，有来自两方面的说法都不能令我信服：一说归罪于改革，认为过去实行“社会主义”时期，这些问题都没有。过去如何陷入绝境，已如前述。我感到持此类论点的如果是未及亲历那个年月的中青年，则是属于无知，少不更事，或受某些隔岸观火的洋人或境外华人的标新立异之说

的影响，或者是只以当时信息极端封闭下的官方书面文字为凭，而无视事实。例如看到 1958 年“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文本就根据自己主观臆想大做文章，肯定“大跃进”。殊不知写在纸上的与实践的相去甚远，其实关于“大炼钢铁”、“放卫星”的恶果的资料也比比皆是，还有众所周知的彭德怀冤案，却都摒弃在这些人的立论依据之外。这些不顾事实的论调竟成一家言。盖因在我国宣传和教育中对于刚过去的那一段真相始终讳莫如深，歌颂之至少比揭露之少犯禁，由无知导向偏见是很自然的。若是年龄足以成为过来人的老人，如此健忘，那么我不免猜测他们当时至少处于某种权

势阶层，或者囿于某种僵化的教条，执著不化，无视活生生的现实。例如有人认为“国营”或“公有”就代表社会主义，现在的问题都源于“私有化”。这就回到了老问题：谁代表“国家”或“全民”拥有这些企业？他们是一群完全超脱于私利的，“特殊材料构成的人”？既然这种人是不存在的，作为一种机制，行政垄断与大财团垄断究竟有何区别？就以平头百姓深以为苦的房价来说，不都是掌握在“国家”手中么？现在常笼统说“房地产开发商”，暴力拆迁事件都是开发商之过。其实“房产”可以是私营，而“地产”是国有的，没有地，如何盖房？要知道我国是少数世界上土地

完全国有的国家，掌握地产的政府或“公家”，为什么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解决民生问题呢？又如通信、能源的垄断权也是“公有”的，这方面近来已有许多精辟的分析文章，归根结底，部门、集团以及有关的个人的既得利益是实，“全民利益”是虚，除非取消垄断的权力，前者不会让位于后者。我们今天作为消费者如果还享受日常生活中一定的方便和丰裕，恰恰是由于在这些领域内民营经济发展，引入了竞争机制。

我的困惑（4）

另一说法是“初级阶段”论：说是我们不能与发达国家比，因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待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一

定阶段，许多问题就会解决。不少论者举出发达国家历史上人均收入达到某个数字时，腐败最厉害，以后逐步改善。人民福利也依此说。也就是“腐败无害论”（以前此说也用于污染，主张“先污染，后治理”，现在污染到了这个地步，这种公开的论调已难见天日了）。回到我的困惑：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必须与资本主义自发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样残酷吗？人家一百年或几百年的经验教训不足以为我们借鉴，必须从头再走一遍吗？再者，发达国家靠的是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强大的舆论监督、在结社自由基础上的劳工和各行各业有组织的

长期斗争、精心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健全的法治体制下的立法和执法，经过全社会艰难的、锲而不舍的斗争，才遏制了权力和金钱的腐败。但也没有根治，至今还是在“魔”与“道”的消长斗争之中。如果这些都被冠以“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如何反腐？依靠一个党的集权，自上而下的打击难道更有效？腐败之源究竟是市场还是没有监督的权力？诸如黑砖窑奴隶劳动、频发惊人的矿难等，都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吗？或者说，都是由市场经济引发出来的，与政府、“公家”、体制无关？

再说教育、医疗。欧美国家义务教

育基本上是各地方政府的责任。如果说我国“初级阶段”财政不敷，那么每一个县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钱（还不算在饭馆白吃不给钱的）有多少？自县政府以下公务小汽车和办公大楼是“初级阶段”水平吗？似乎还很少见到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处于什么阶段），在同一个地方学校校舍的破败和办公大楼的豪华呈这样鲜明对比的。关于医疗，我们的医疗资源有限，医疗质量和覆盖面当然不能与发达国家比。但是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高官、巨富与一般平民的比例，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像我们这样向权贵倾斜？“资本主义”乎？“社会主义”乎？

据说，“民主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性质，我们实行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民主”与“科学”不能相容，排除了“民主”的“科学”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里？上世纪80年代就听说有一位居高位的老革命访问英国后叹曰：我们想要做的，他们都做到了，只要换成共产党领导就差不多了。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主要在于是什么党领导？谁（who）做，比做什么（what）更重要？余惑之焉。所以，我对各种“提法”和口号只能听其言而观其行，从常识和现实出发，只对“问题”感兴趣，对“主义”只好敬谢不敏了。

（2008年）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1）

自“五四”运动先驱们提出“德、赛”二先生，曲折走来到今天，终于“民主是个好东西”公开见诸权威报刊，最高领导人公开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进而阐明：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不再冠以“资产阶级”，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公开讨论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民主是对专制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其核心一是公民参与，二是权力的监督。人类在文明进步中经过长期摸索，建立

起一种机制，保证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公共事务，同时明确各类掌权者的权限，并受到各方监督，杜绝某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有“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这就是民主制度。我们一般想到民主，往往先想到议会和选举，于是又会联想到议会和选举的种种流弊和实施的困难。事实上，如果没有完善的配套机制，单纯的选举并不能真的体现民意，而且确实可以弊病百出，中外“贿选”、“黑金政治”例子举不胜举，不必赘言。实际上民主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必要组成部分是法治和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指的是公开表达意见，不是私下议论。民众议于野，自古以来就

存在，尽管专制君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甚至使出密探举报、鼓励互相揭发等手段，也很难杜绝街谈巷议。但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必须有公开发表、形成“舆论”的途径，那就是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因此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分不开，而且必须受到法律保护。新闻自由至少有以下几层意义：首先，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公民参与”必须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上。新闻媒体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传播真相，所谓“知情的公众”（informed public）才是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

过，将来也决办不到。”消除无知，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发展新闻事业。毋庸赘言，愚民政策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如果公众参与政治，那么他们必须有机会了解与其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国家的主人——相称的信息。

舆论更主要是实行监督的功能。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已经没有什么争议。监督有两种：政府内部的互相监督和公众的监督，而后者更重要。因为，如果只有政府内部的监督，而不为广大公众所知，也无法参与，那么无论制度设计得多么精致严密，最终流于无效。中国历朝历代不乏“言官”的设置，“谏议大夫”、“御史”、“监察”，等等，

也不乏直言敢谏尽责的官员，甚至以身殉，但总是正不压邪，无法挽救朝政的腐败乃至灭亡。即使在现代，如果设想西方国家的国会的争论都是在秘密中进行，公众不得与闻，媒体不得报道，或只许根据权威发布的内容报道，那么，难免形成暗箱交易，议员虽是民选，其作为选民代言人的资格就值得怀疑了。事实是，除了某些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议题外，欧美国家大部分讨论都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每个议员的立场、对议案投票的记录都是透明的，才能使各方权力和利益得到公众的监督。

在民主制度中，新闻自由的基石之一一是自由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而

对于在位者，运用手中的权力压制批评是一种很难抵挡的诱惑。所以，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独立前后，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也是在与政府干涉的反复斗争中实现的，而且同法律的完善过程相一致。美国独立之后，那些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的开国元勋们成为执政者。他们如何对待反对自己的舆论，关系到美国向何处去的选择：是继续进行社会变革，把那些战斗口号付诸实施，还是地位一变，立场就变，转而压制言论自由？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宪法通过以后，紧接着通过的十条修正案，称《权利法案》，至关重要。因为它用明确无误的语言杜绝了任何侵犯信仰、言论、出版、

结社自由的法律的出台。同时，开国的执政者的决心也非常重要，特别是杰斐逊以坚定的信念维护新闻自由不遗余力。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2）

在台下时倡导言论自由是一回事，对杰斐逊最大的考验是在他当选为总统之后，对待反对政府的舆论是否采取“叶公好龙”的态度。那时的反对言论并非温文尔雅的说理，而是包括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漫骂乃至人身攻击，并且对公众是有影响的。这种攻击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不过总的说来，他还是忍了下来，坚持做到不借助强制，光凭自由讨论来宣传和保护真理，来保持政府行动

和观点的纯洁和正直，以此作为对民众判断力的信心的考验。对于那些真正的造谣污蔑如何处理？美国后来通过的有关诽谤罪的法律确立了“只有事实真相才可以用于诽谤诉讼辩护”的原则，而废除了旧的从英国继承来的政府可以以“煽动性诽谤”罪起诉公民的法律。这就是把政府与私人放在了完全平等的地位。从此新闻界以及任何个人对政府以及上至总统的任何政要的揭露、批判，和对私人一样，是否构成“诽谤”，只看是否属实，与对方身份无关。也就是说不能因为被批评的是政府官员就构成“煽动”或“危害社会”罪。在这种法律制度下，美国各届领导人经得起“骂”，

也是一种基本功。

这种新闻自由对美国的社会改良，最终避免动乱保持稳定，起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和事件上，总是先有强大的舆论，然后有改革的法律、政策、措施。例如 20 世纪初期美国在急剧工业化过程中两极分化日益尖锐，权钱交易，政治腐化严重，此时美国新闻报刊重拳出击，对各种社会不公、丑恶现象、富商、高官痛揭痛批，出现了著名的“耙粪”文学，与其他社会进步力量共同促成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进步主义”改良运动，对美国一个世纪的长治久安有深远影响，新闻工作者获得了“人民斗士”的美誉。还有我们熟悉

的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反越战和民权运动等，平时无处不在的对时政和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批判不断，对社会起到净化作用，更不必赘言。

就在今天，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无时无刻不在舆论的监督批评之中。以后一个短时期内美国人感到空前的危机，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新上任的小布什政府得到了不寻常的支持。大约从 2002 年下半年起，国内置疑布什政府政策取向的声音逐渐升起，包括反对攻打伊拉克。随着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的局势混乱，付出的生命和财政的代价日益高昂，更重要的是，以反恐为名，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反对的意见日益强烈。

翻开《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大报，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批评政府内外政策的深度报道和社论。使美国在全世界蒙羞的虐俘事件，率先曝光的也是美国和英国的媒体，美国国防部长曾要求电视台晚一些发表那些照片，免得美国士兵在伊拉克处境更加不利，却遭到媒体拒绝。这种揭露，尽管一时间使美国政府处境尴尬，但是事实上促使政府采取措施使坏事得到控制，实质上当然对美国有利。

批判者的武器主要还是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而维护现政府政策的反批评者的武器则是“爱国”和“安全”，即指责批判者危害反恐斗争是不爱国行为。

对此，批判者的回答是：他们保卫的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如果这一凝聚各族裔美国人的原则精神遭到破坏，美国就将变质，就不再是美国，也就无所谓“安全”。最激烈的言论是：美国不毁于恐怖主义，而将毁于决策集团中“新保守主义”之手。

可以设想，如果美国政府官员有权力压制新闻，对待逆耳之言或封报刊、或追究罪责，甚至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有关人士，他们未必不会这样做。事实上，当政者已经尽其所能缩小和掩盖真相，但是在美国的制度下他们无权封杀舆论，这就是美国的自我纠偏的机制，也是其希望所在。不但如此，美国哥伦

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丹·拉瑟因为独家率先报道美军虐俘丑闻，获得在纽约颁发的 64 届“皮巴迪广播节目奖”，举报虐俘事件的美军士兵约瑟夫·达比也获得著名的“肯尼迪勇气奖”。报刊高调报道，说明媒体和公民自揭家丑的传统和勇气还是得到承认和鼓励。虐俘事件可能是一个契机，唤起美国的社会良知，促使思想精英重新全面审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和理念。

讲美国，只是举例说明一种普适性的内涵和民主的必要条件。当然，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施民主的形式和途径有所不同。说它不言而喻，因为纵观历史，

横观世界，即使方今已经公认的欧美民主国家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形式也都是不同的。这点无人否认，所以根本不必担心全盘照搬某一个外国的制度，即使有人想照搬也搬不了。相反，过分强调“国情”却足以成为阻碍民主进程的借口。现在更需要强调的是民主普适性的内涵。

另外，思想、言论自由更深层次的意义是，有助于造就善于独立思考、心胸坦荡、富于正义感、诚实勇敢的高素质国民。一个众声喧哗的社会当然比“万马齐喑”的社会有活力。一国的国民如果长期思想禁锢，从小就培养察言观色，按一定“口径”发表言论，不敢讲真话，甚至已经不知独立见解为何物，长此以

往，民族精神只能不断萎缩，靠虚骄的豪言壮语、煽动性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振兴不起来的。这样的精神状态而求其堪与世界竞争的创新能力和出现世界级思想和学术“大师”，无乃缘木求鱼乎？

（2007年）

跨世纪中国人将何以自处？（1）

对巴尔干的持续轰炸是一次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充分表演，特别是我国驻南使馆被炸更引起了我国人民强烈愤慨和谴责，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喉舌”传媒所发出的信息和论调，还

有不知哪里忽然冒出来的一些“战略家”占据舆论要津，头头是道地“分析”，给人的感觉似乎又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新清算自开放改革以来的（至少是）外交路线。由于涉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势必也涉及国内建设的路线。令人大惑不解，也令人担忧。

冷静地、理性地思考，实际上世界局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的问题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利益、需求、力量对比等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为什么竟会发生如此大的震动，好像对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对世界形势的看法都要“重新认识”呢？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十三亿人民的长远福祉究竟何

在？

战争与和平 这是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政策的出发点。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一向以“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战争（不是局部战争）就不可避免”为理论基础。因此有“深挖洞、广积粮”，“大三线、小三线”，“全民皆兵”，等等，一系列口号和政策。而且，总认为有人“亡我之心不死”，先是“帝”，后是“修”，挺身而出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结果几乎与世界所有强国富国为敌，也没有拯救弱国穷国，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和时间，自己却濒于经济崩溃。好不容易到80年代初，邓小平和一批高层有识之士经过深思熟虑，排除

阻力，得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改革开放的路线才得以推行。因为“开放”的实质就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包括与之相联系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实际上毛泽东主席乒乓外交的战略决策已经打下基础。如果认为对方不可避免地要发动世界大战，而且主要是以我为对象，如何能够开门揖盗？那正是闭关锁国的依据。

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非自今日始，特别是干涉别国内政是它的外交常规，当初我国领导人在得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时并未忽视这一事实，自从与美国建交以来，对它这方面的批评和斗争也从未断过。但是霸权主义不一定等

于战争，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还是两回事，引起局部战争的动因也不一定是帝国主义（例如两伊战争）。美国并没有变，是我国宣传的调子经常变化。所谓美国的炸弹使我们“清醒”之说，如果指的是美国国际行为的霸权主义，难道原来我国的外交决策和实践就是建立在糊涂的基础上？要么是提出此论者自己原来不清醒？如果又回到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说，如有的文章说现在只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间歇，而且历史把中国推到下次大战的最前线，那么这种论调不但依据不足，而且十分危险。以在战场上吸引火力，高呼“向我开炮！”的“英雄”姿态用之于国家民族的安危，是极端不负

责任的，所幸对决策尚未产生影响，否则适足以祸国殃民。但是这种论调连篇累牍地在本该是“喉舌”的传媒上宣扬，对国内外舆论都起误导作用。

霸权与民主 美国和西欧各国对内实行民主和对外行强权政治是客观事实，一贯如此，可以并行不悖。民主是一种制度，不是一种道德标准。国人的逻辑往往是：行民主者应该是“好人”，好人就不该欺侮别人，如果竟然欺侮别人，就说明你不是好人，那么民主也是假的。其实，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其精髓就是权力的制衡，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个人或寡头专制。其保证是一整套法制程序、游戏规则，外加在言论自由

基础上的舆论监督。不论在实践中有多少缺陷和“异化”，至今还在起作用，没有人能超越于这套规则之上。但是在国际上尚无这样有约束力的机制。强权政治还在起主要作用，尽管二战后有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规则，小国的发言权也大大增加，但是对霸权的约束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靠力量均势。冷战结束后，很明显，对美国外部的制约力量削弱，内部又由于武器先进可以避免人员伤亡而大大减少了本国人民的制约（如越战），使美国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野心和可能都有所增长。最近的事态更加证明“多极化”只是一种愿望和离现实尚远的目标。但是必须把国际上的霸权主

义和国内的民主制度分开，不能据此反证其在国内实行的就不是民主，甚至进而认为“民主”、“自由”从根本上就不可取。毋宁说正好相反，欧美国家之发达和强大的原因之一正是得力于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这才使它有条件在国际上称霸。他们不平等对待弱小国家，但其本国人民至少相对来说比任何其他制度的国家都享有更平等的权利。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把自己应走的道路系于有关国家对自己的态度，因而总是走不出那个怪圈。对于“老师为什么老是打学生”这个问题应该换一个思路：他有什么本事，有什么秘诀老能占上风？我能否学到手？过去由于对西方的失望，

转而以俄为师，结果不也是受欺侮吗？如果前苏联的道路真能使我强大，也不能因为它对我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不学。这个道理其实不深奥，从晚清到如今一个半世纪以来不乏有识之士对此做出过精辟论析，但是民主的呼声总是为民族主义所淹没，或者说反民主的力量总能利用国人本能的、带有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情绪抵制向现代化方向的改革。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行为正好提供机会和动因，客观上互相配合，吃亏的是中国人自己，被牺牲的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今天好像又走进了这一怪圈，从有些论调看，似乎一些原来反对开放改革的力量和言论乘机都冒了出来，实

实际上又是一次不点名的“批邓”，或者断章取义利用邓的某些话反对其根本的路线和方向。不仅如此，似乎一百年前放眼世界的先知者早已“启蒙”的，现在又恢复“蒙昧”，他们都已扬弃的，现在又拣了回来。

跨世纪中国人将何以自处？（2）

军事、经济和智力 这次北约利用其先进武器对难以有还手之力的南斯拉夫持续轰炸，给人以深刻印象，说明军事力量在国际斗争中还是最后的依靠。这点没有疑问。所以美国对于保持其军力和尖端技术遥遥领先的地位才那么重视和敏感，所谓“中国核间谍案”之喧嚣

除政治原因外，正代表了这种心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西方之军事力量无不建立在雄厚发达的经济力量的基础上，因为这关系到更加根本的民心问题，绝不是牺牲黄油要大炮（如苏联）。今后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的较量，经济因素的分量日益重要，而经济力量靠的是智力和人尽其才的机制。“知识经济”或“智能经济”是大趋势。这一历史趋势也不会因为科索沃一仗而改变。因此，从长远和实质上讲，21 世纪的争夺还是智力和人才之争。美国最大的优势仍在于它对人才的吸引力。事实上它的尖端技术实验室华人比例极大，据说有一年的物理学会年会上 90%的代表是黑头发，

其中 90%是华裔，可能并不夸大。所以它在大搞所谓“间谍案”的同时又急忙安抚华人，国会通过决议、政府各级官员不断发表讲话，就是因为华人对它的高科技贡献太大，实际上是离不开的。这一批智力资源即使有十分之一能在国内发挥作用，我国的发展速度将不可以道里计。何况现在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失。

以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为例，不知有没有做过统计，近二十年的毕业生有多少留在国外，人在国内的有多少是在为外企工作，再剩下的又有多少真在用其所长，做出应有的贡献？这里的关键是营造一种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而不是单纯鼓励回国。良好的环境涉及一系列

的机制、政治改革和观念的更新，也不仅是对个别人个别项目慷慨拨款能解决问题的。一句话，只有加速深化改革才能逐步扭转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的流向。一百多年前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列强的优势绝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而现在忽然武器决定论又冒了出来。有人竟公开说只有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军事现代化当然是题中之意。第一，现代的军事不再以人力取胜而是以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第二，美国这种国家的高额军事开支一方面是其称霸世界的需要，一方面与国内各种利益集团争夺有关，为此需要制造各种“威胁论”，各部门争相强调

自己的重要性，并且反映到国会各派的辩论中。因此其军费浪费的成分相当大，也就是超过其即使为确立霸权的实际需要。它能浪费得起，我们浪费不起。果真如有些报刊文章所鼓吹那样，一个炸弹事件就要促使我国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放慢已经滞后的政治改革，而且牺牲尚未兑现的“科教兴国”，把有限的资源去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那将是自杀的行为，至少是杀鸡取卵。苏联的教训是前车之鉴。当然这并不是国策，但是这类“精英舆论”所造成的压力却也不可小看。

主权与人权 美国的外交思想中从来不大承认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其干涉

范围随实力的增长而扩大。即使在 19 世纪初的“门罗主义”时期，已经视拉美为其势力范围，不许欧洲国家染指，而自己则有权干涉。二战后，无论是冷战中还是冷战后，美国更加明确地以推行其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为干涉的依据。对于美国以人权的名义任意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应该进行抵制和斗争，并揭露其对不同国家的多重标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承认“人权”有其普遍的原则，这一观念虽源于欧洲，却非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自近代以来前赴后继的革命中，当然包括争平等的人权的目的，其中既有反对本国专制政权的压迫，也有反对洋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与中国人不

平等的特权。自从联合国有了“人权宣言”之后，人权就不再是纯属一国范围之事，所以对于南非的种族隔离才能有国际社会长期的制裁。因此，认为只要是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发生的任何惨无人道的暴行，他国均不得干涉，作为原则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将越来越如此。只不过严重到什么程度，属于什么性质，以何种手段进行干涉，需要国际社会慎重讨论，得出共识，不能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也不能轻易动用武力。果真今天再出现希特勒大规模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屠杀那样的事，而还没有发动对外的侵略战争，我们恐怕不能以纯属内政为由反对国际干涉。当年保卫西班牙

牙民主政权，苏联以及国际进步人士都参加了战斗，而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干涉主义导致佛朗哥政权稳固，是受到谴责的。又如类似印尼发生的对华人的暴行，如果是更大规模的、长期持续的，并且明显受到政府支持，以把华人赶出印尼为目的，造成大批难民流到我国（这是假设的场景，所幸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我们大约会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跨世纪中国人将何以自处？（3）

“主权过时论”固然不能接受，但也应该看到在今天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也是逆潮流而行，难以作为普遍的原

则“占住理”的。主权之重要在于保护本国人民的集体人权不受外力伤害。假如代表主权的政府是专事镇压人民的反动政府呢？从孙中山到共产党，在进行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中不是都以争取人民的权利为口号，不是都强调国际支援的重要性吗？如果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那就等于否认世界上还存在压迫，否认受本国反动政府压迫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或者说，这种革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得到国际的同情和支援。这是从以倡导世界革命为己任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鼓吹维持现状了。

所以，对科索沃问题，文章做在人道主义上比“主权”更有说服力。因为

北约的持续轰炸所造成的对人的伤害和无穷的后患，远比它宣称要反对的更加不人道。另一方面，南联盟的种族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塞族恃强欺人应负主要责任也是事实，只是其性质和规模不能与希特勒灭犹相提并论。我们的立场应是反对将复杂的民族矛盾任意扩大无限上纲，并偏袒一方，特别反对殃及无辜平民的狂轰滥炸。总之，对于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应多研究一些历史案例，做出有说服力的论断。搞政治、搞外交，也许可以实用主义，一个时期强调某一方面；理论工作却必须考虑到长远的普遍的适用性。何况，今天在国际上，即使是强权也必须找理论上的借口，不能

再像 19 世纪的殖民帝国那样，以赤裸裸的种族优越论为依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开始决定对科索沃武力干涉时所采用的“理由”是得到国内外多数舆论认可的，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的情况可以看出。只是在其恶果日益明显时，批评的意见才渐渐多起来。从长远看，占住理还是重要的。

今天，由于北约惨无人道的轰炸，南斯拉夫是受害者，我们似乎难以公开批评米洛舍维奇，但是对于他原来的所作所为应该心中有数，绝不能把自己放在与他同仇敌忾的地位上。我们有少数民族问题，也有西方不断干涉的西藏问题等，但是我们的民族矛盾情况与巴尔

干非常不同，我国政府在民族问题上可能有过错误，但从未采取过那种有计划的“种族清洗”政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实际利益上都应与之划清界限，而不能认同。对于他国的种族冲突我们应坚守中立，而现在的舆论完全偏袒塞族。国际舆论认为我们是兔死狐悲，对此说法绝不能默认。再说，巴尔干问题本是欧洲问题，斗争和妥协都是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我们是外人，既无实际利害关系，也无能为力。俄罗斯在传统上就是外交强手，从沙俄到斯大林到目前哪怕是处于困境的现政府，在外交上都是十分老练、高明，而又现实，进退有据，他们根据自己的

利益和现实可能与西方周旋，我们是被撇在一边的，大可不必自作多情。

毋庸讳言，我们与美国将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第一，实力悬殊不可以道里计（这是全面的，迄今还看不到差距缩小的趋势）；第二，双方互有需求，但是需求的程度显然是不平衡的；第三，尽管美国实行霸权主义，在国际上常遭到批评，但是相比之下，它并不孤立。原因之一是它的霸权包括“顺我者昌”和“逆我者亡”两个方面，而老帝国主义和苏联不愿做或做不到前者。冷战时期的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以及扶植日本的政策等都做到了“顺我者昌”，东亚“四小龙”中起码台湾和韩国与它

的扶植直接有关。它做不到“逆我者亡”，却能使“逆我者”衰，或者至少增加发展的困难。原因之二是它的对立面并不都是无辜的、正义的代表，不像过去的南越解放阵线那样得到国际同情；另外，更重要的是，它高举的“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不论自己在实践中如何多重标准，如何为其霸权服务，甚至伪善，就其核心思想而言是代表了世界进步的潮流，不仅是在道义上而且是在实践上。这次经历了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痛定思痛，并不是更加强调“亚洲价值观”，而是相反，进一步认识到统治者利用这一口号反对民主、保护腐化的实质，因而客观上在观念上

更向西方靠拢。60年代，我国高举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帜，不论在实际政策上有多少错误，这一口号确实代表当时的进步潮流，至少在道义上站得住。今天，世界各国的主要需求是发展经济和民主改革，并且跟上全球化的潮流。我国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时仍需要反对美国的霸道行径，但是作为一项总的口号，不可能建立反美或反霸“统一战线”，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上，不论我们认为多么没有道理，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更害怕“中国威胁”，而宁愿谋求美国的“保护”。

我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取得了空前速度的发展，举世瞩目。百年来，从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国际地位，这足以使我们自豪，更应珍惜改革的成果。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积累的问题已经成堆，今后将步入改革以来最艰难的阶段。国际环境对我国并不利，“得道”不一定多助，而“失道”则肯定孤立，甚至带来危险。中国正处于过渡阶段，“崛起”的趋势足以引起他国警惕，视为威胁；而实际力量又不足以确立使国际作为既成事实来承认的强国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切实体会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的智慧和深远用意。实际上，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不争气，是国内弥漫性的腐化和种种严重的弊端。当务之急，是切实加强内功，兴利除弊，即邓小平所

说“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对于青年一代的教育尤其是艰苦的任务。绝不能承认烧领馆、砸使馆的行动是爱国义愤，所谓“民气可用”。一个世纪以前，还有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这样有胆有识、敢以死谏之士，在国家危难之际坚决反对围攻外国使馆，而被进退失据的慈禧太后杀头。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的高潮中，周恩来总理曾挺身而出，正面批评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并对当时狂热中的红卫兵耐心进行解释教育。谁能说这些前辈的爱国立场不坚定？将要跨进 21 世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如

果再一味鼓励以廉价的空洞口号代替脚踏实地的点滴工作，以排外的民族情绪的发泄来代替切实的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自重自强，以虚骄的姿态掩盖骨子里的崇洋，甚至培养两面派和机会主义者，听任民族劣根性驱赶民族优良传统，野蛮淹没文明，我们的民族将要退化，这是怪不得任何外人的。

今天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率多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做梦都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但是又见证了太多的内耗和时机的丧失。现在外部世界一日千里，我们再经不起在那个怪圈中循环了。

这篇文章写于今年 6 月，原不打算发表，到 7 月底因偶然的机会印出来给

一些朋友看看，无非是茶余饭后发发感慨而已，竟得到发表的鼓励。现在有些事已经时过境迁，不过文中思考的问题却是长期存在，今公之于众，实话实说，不求委婉，立此存照而已。

（1999 年）

此电子书由习之网 www.5sgou.com 搜集于互联网. 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 如要支持作者, 请购买正版